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的中国

三

毛泽东时代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推荐重点图书

郑谦
张化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走入“文化大革命”迷途	1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2
“我最担心的是中央出修正主义”	2
“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与中国	8
“中国赫鲁晓夫”的由来	12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够被发动起来？	14
二、“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6
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16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	23
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	26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29
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9
“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	33
围绕工作组之争	36
八届十一中全会	44
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49
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连	49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52
“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抓叛徒”风潮	57
溢出文化领域的“文化大革命”	59
“革命”，还是破坏？	66
第二章 “大乱”与“大治”	70
一、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	70

“一月风暴”	70
“全面夺权”	74
二、正义的抗争	79
夺权引发大乱	79
二月抗争	82
三、毛泽东采取措施稳定局面	91
迭发文件,限制动乱	91
解放军支“支左”与军管	93
支农、支工和军训	96
四、从“天下大乱”到“全面内战”	100
动乱趋于失控	100
“天下大乱”达到“顶峰”的三个月	103
毛泽东、周恩来采取有力措施抑制动乱	106
五、“全国山河一片红”	111
“右倾翻案”与“反右倾翻案”	111
再次采取断然措施制止动乱	115
“工宣队”进驻学校	117
“全国山河一片红”	120
六、“团结、胜利”的大会——九大	124
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124
中国共产党的九大	129
第三章 热烈而肃杀的“理想”社会	137
一、“天下大乱”之后	137
大乱之后的政治格局	137
平息大乱余波	141
大备战	146
二、继续革命的“法宝”	151
“斗、批、改”的由来	151
“斗、批、改”的两个基本内容	156

“六厂二校”的“样板”	163
三、“斗、批、改”的几项内容	166
“清理阶级队伍”	166
革委会建设	171
整党建党	175
教育革命	181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88
干部下放劳动	191
四、被“革命”推动着的经济建设	195
“抓革命、促生产”的发展模式	195
“跃进”、“翻番”	196
“五小”工业与社队企业之花	203
第四章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与覆灭	206
一、动乱孕育的怪胎	206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投机	206
在动乱中恶性膨胀的宗派	211
两个阴谋集团的勾结与争夺	213
二、九届二中全会	217
林彪公开表达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	217
两个阴谋集团间的第一次公开冲突	221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激烈斗争	223
三、“批陈整风”	231
“批陈”与困惑	231
对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批评	235
“批陈”中的“整风”	238
“四人帮”趁机扩张势力	243
四、九一三事件	245
“超天才”与“联合舰队”	245
毛泽东的南方之行	250

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覆灭·····	252
第五章 1972 年周恩来未能完成的整顿 ·····	256
一、“批林整风”运动·····	256
采取有力措施稳定形势·····	256
稳妥处理重点地区、单位的人和事·····	261
“批林整风”之初·····	262
二、毛泽东的反思与变化·····	268
对极左思潮更加厌恶·····	268
“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	270
三、周恩来领导的 1972 年整顿·····	273
周恩来反对极左思潮的一贯立场·····	273
排除各种障碍,落实干部政策·····	278
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经济政策·····	282
开创对外经贸新局面·····	289
对农业政策的调整·····	295
落实党的教育、科技、文化等政策·····	298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307
1972 年批判极左思潮的高潮·····	309
四、“四人帮”反对批判极左思潮,周恩来整顿被迫中断·····	312
“四人帮”对批判极左思潮的反扑·····	312
毛泽东态度的转变·····	315
周恩来勉力苦撑,继续批判极左思潮·····	316
周恩来整顿的中断·····	319
五、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323
党的十大的筹备·····	323
继续九大“左”倾错误的十大·····	325
六、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	328
“天下大乱”对外交工作的严重破坏·····	328
缓和中美关系和中日建交·····	330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333
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333
第六章 从“批林批孔”运动到四届人大的召开	337
一、从“要注意上层建筑”到反击“右倾回潮”	337
“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337
“四人帮”抓住“批孔”大做文章	341
从教育界开始的反击“右倾回潮”	344
二、“批林批孔”运动	348
“四人帮”鼓吹“大乱是大好事”	348
毛泽东说:批林批孔搞乱了	358
三、“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362
毛泽东告诉江青:不要由你组阁	362
江青“组阁”阴谋的破产	369
四、“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374
第七章 邓小平主持工作与全面整顿	377
一、用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	377
以解决铁路问题为突破口	377
四条整顿措施和“三项指示为纲”	382
围绕“反经验主义”的斗争	384
二、在经济问题上理出思路	388
扭转财经困境的努力	388
制定加快工业发展的章程和长远规划	391
三、整顿军队,加强国防	395
绝不容许野心家插手军队	396
加强国防工业	400
加快发展国防科技	402
四、整党的初步措施和部署	404
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404
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	408

五、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	410
“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	410
“在科技领域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	412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起草和修改	413
六、邓小平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	417
教育界的主要问题是极左思潮	417
学校不培养人是要拖后腿的	419
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	421
七、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战	423
毛泽东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	423
“要搞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	425
意识形态领域要有不同的声音	427
八、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	430
邓小平提出全面整顿和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430
农业发展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433
九、“四人帮”的反扑与全面整顿的中断	437
评《水浒》风波骤起	437
全面整顿的中断	440
第八章 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	444
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得人心	444
“教育革命大辩论”和极左思潮的再度泛滥	444
沉闷的中国	447
二、“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453
人民悲愤的心声	453
天安门广场的较量	457
三、“四人帮”的反扑	465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升级	465
全国再次陷入混乱	468
四、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470

第一章

走入“文化大革命”迷途

1966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我国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克服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满怀信心,努力生产,强烈地希望经济得到更快发展。

196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六六年》。社论中说,1966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一个宏伟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我们要在农村和城市更加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力争农业生产逐年有所增长,更加有效地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在不断技术革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现有工业企业的生产潜力和交通运输业的运输能力,同时要大力建设一批新的企业,加强国防建设,加强基础工业,加强交通运输业,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社论号召:我们要努力争取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社论的这些基本观点,体现了自20世纪60年代初调整以来党中央的一贯思路,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取得调整时期重要成果的基础上,要求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迫切愿望。

同日,《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了题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元旦社论。社论中说,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就是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社论批评了“经济好就是政治

好”，“生产好就是政治好”的观点，认为它是“错误的”。文章强调，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离开了阶级斗争，就无所谓政治；突出政治，就要在各条战线抓阶级斗争，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彻和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是无产阶级政治作统帅作灵魂，还是物质刺激、个人名利作统帅作灵魂，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

这篇社论的基本观点，反映了自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不断发展的现实。

在当时，这两篇权威社论侧重点上的区别并没引起多少人的注意。1963年以来，虽然“四清”运动及意识形态领域中不断发展起来的批判使人们感到困惑和不安，但从严重困难局面中迅速恢复的国民经济又使人们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可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能够发动它呢？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我最担心的是中央出修正主义”

从1964年起，毛泽东把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这个问题，从深层次上反映了当时我国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的一些矛盾。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毛泽东的这段话，集中地表明了，在苏共二十大前后，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他认为，曾经被全世界公认为社会主义唯一标准的苏联模式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的弊端已开始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社会主义各国的建设道路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各自的具体情况进

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当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应当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这一认识反映了当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要求,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这一超越意识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

认识到必须解放思想,认识到苏联模式是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的,这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上半期已属难能可贵。但是,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后,另一个更为复杂、艰巨的任务又摆在人们面前:如何超越苏联模式,怎样探索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简单地否定苏联模式就能走上改革的坦途。在改革苏联模式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各国都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付出了艰巨的努力,有的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进行这一探索,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大跃进”是不成功的,但它却反映了超越苏联模式的强烈愿望;“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更与苏联模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对苏联模式的改革,除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深入观察,对本国国情的深刻了解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熟练掌握外,还必须要有对当代资本主义、对时代及其发展趋势的深刻而全面把握。特别重要的是,还要有本国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正如在一个小农经济占多数的国度里,对价值规律、现代管理、现代信用制度等等的理解、重视和运用,远不能与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一样。同样是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观察和认识,比较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结论往往存在许多明显的区别。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如果就改革的物质基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些思想观念来看,中国不能与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毛泽东用于超越苏联模式的思想资源中,除了对苏联革命与建设实践长期的观察和思考外,还有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有中国历史上大同世界的种种描述及他早期革命生涯中“新村”活动的烙印,更有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丰富而又成功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经验的影响。正是这种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中国

当时改革的许多特点。1958年“大跃进”的尝试,虽然带有超越苏联模式的强烈愿望,但其中许多内容却往往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相左。例如,忽视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对现代管理、制度、法制的陌生和轻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可能产生“资产阶级法权”的忧虑;崇尚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乃至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对物质利益可能产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深切忧虑,相信简单的、不富裕的生活能产生和保持足够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反过来又可以对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等等。

毛泽东是“大跃进”的热心倡导者,但他又是较早发现“大跃进”错误并采取坚决措施纠正错误的人。从1958年11月起,毛泽东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发布了一系列指示,批评和纠正“左”的错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与当时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和深刻性相比,这些认识还只能说是初步的。所以,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一些偶然因素的出现便轻易改变了纠“左”的良好势头,随之而来的“反右倾”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严峻的困难局面推动着以毛泽东为首的共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国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道路。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中,在纠正“大跃进”失误的过程中,在修复传统模式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对传统模式改革的积极探索。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一次书生式的议论中说:如果可以重新从头搞社会主义,我将用另一种方法来搞。^①田家英的这番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党内许多高级干部的想法。

实事求是的探索很快取得了一批初步的成果。例如,大幅度地降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确立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中央许多负责同志对“包产到户”的认可或赞同,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平反1958年来一些错案以缓和一些方面的紧张政治关系,制订

^① 参见逢先知等著:《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

和实施一系列有关发展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教育的条例，等等。这些措施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果，扭转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困难局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努力都在不同方面反映着某种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问题在于，在当时的条件下，特别是中国还落后的经济条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认识，苏联传统模式及其派生出来的一些模式（如带有某种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模式）还具有深远的影响。再加上当时整个国际形势方面的诸多因素，中国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这样，调整时期产生的这些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与传统观念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发展了。1964年至1966年间毛泽东对“中央出修正主义”忧虑的日益加深正是这一矛盾的反映。

1966年5月7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夕，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个报告的批示（即《五七指示》）中，又一次比较系统地谈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看法。他说：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除打仗之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我们的各抗日根据地就是这样做的。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他认为，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最后,毛泽东指出,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反映了他当时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设想。这些设想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在随后的调整时期,毛泽东根据自己对1958年经验的总结和思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沉的思索。他放弃了“大跃进”时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发展了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长期性的认识。随着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意见分歧的加深和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毛泽东在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想中进一步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内容。这些新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一些重要文件(如《五一六通知》以及《五七指示》)中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

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五七指示》与“大跃进”、人民公社有许多近似的地方,它反映出毛泽东心目中所向往和憧憬的社会主义一些重要特征。这种社会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它以阶级斗争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保障,对生产者个人来说,则以阶级觉悟、革命精神作为压倒一切的激励源泉。在这个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实行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对于商品生产,虽然不能不借助它来发展经济,但因其资产阶级的属性,必须加以限制。社会分工虽然是当前生产所必须,但因其会导致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平等,也要加以限制,并应创造条件使其逐步缩小。在分配领域中,也应缩小差别,甚至可以实行大体平均的供给制。因为物质利益总会诱发人们的物质欲望,直接威胁到道德的纯洁和高尚,导致精神的堕落,而革命的理想和阶级觉悟能够提供最强大和持久的动力,使劳动者能够并乐于完成任何艰难困苦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种社会可能并不那么富裕,但这可能正是它的优越性所在,因为在一个富裕或高度富裕的社会里,人们往往会付出精神堕落、意志消沉和社会主义变质的代价……

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的这些认识,既反映了马克思经典作家当年对未来社会的某些构想,也包含了他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的认识和超越意识;既有我国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经验和军事共产主义的深刻烙印,也有中国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影响。《五七指示》所展示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虽然包含有一些大胆的设想和富于想像的预见,反映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一些尖锐批判,体现了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追求,但从总体上来看,它是不现实的。它忽视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一种社会形态的决定性作用,脱离了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时期的主题,忽视了商品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它把以残余形态存在着的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希望用不间断的阶级斗争和限制分工、限制差别、限制物质利益等方式来取得对资产阶级胜利的保证,这些都带有经验主义和空想主义的色彩。毛泽东在1966年提出的这些设想,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抗日根据地时已经这样做了,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在革命战争时期有效的经验,在军队里是正确的做法,是不是能无条件地推广到整个社会,特别是推广到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主义是需要发展、需要改革的,但这必须以生产力的现状与发展为出发点;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弘扬战争年代的革命传统和英雄主义气概,但却不能简单地直接搬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的,但它也是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正确与否也必须由实践来检验。

毛泽东的这封信立即引起了高度的重视。5月15日,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转发指示中指出,《五七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8月1日,为庆祝建军39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社论公布了《五七指示》的部分内容,并给予它极高的评价: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按照毛

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五七指示》中的基本思想和一些具体要求,在1968年开始的全面“斗、批、改”运动中开始被全面付诸实施。它深入到几乎所有部门的领域,表现为无数的实验、典型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这种对社会主义认识及其在党内引起的分歧,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追求,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

“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与中国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和格局的变化有一个经典的概括: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4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概括还是比较贴切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产生也与这种国际形势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出现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各国在消灭剥削、发展经济、推进平等、捍卫和平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全世界进步力量感到鼓舞,也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惶惶不安。自上世纪50年代起,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武装斗争此伏彼起,捷报频传,一浪高过一浪,旧的殖民主义国际秩序土崩瓦解,资本主义阵营矛盾重重。美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到处伸手,推行霸权主义,支持各种反动势力,镇压、破坏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受到各国热爱和平、追求进步人民的激烈谴责。与此同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弊端的左翼思潮、学生运动、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也在迅速发展。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后,西方发达国家内广泛的反战运动更是空前高涨,沉重地打击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各国反动政府。“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

龙”、“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便是这种振奋人心的形势的一种写照。

上世纪 60 年代以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出现了一些新的重大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别从南北两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甚至进行赤裸裸的战争威胁，这种情况使毛泽东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危机感。他多次向全党提出帝国主义会不会进攻中国，中国有没有亡国的危险这一类问题。他的这种担心是事出有因的。但他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现实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其引起的世界形势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注意不够。他从马克思、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的一些结论出发，认为战争与革命仍然是当前时代的主要特征，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形势总的格局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面对着两个超级大国的巨大压力，毛泽东表现出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和精神。他要求全党不要怕打仗，要做好早打、大打的准备，要准备美国人来打，也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但他过高地估计了很快就会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性，以及由这种战争引发的世界革命的可能性。这种估计一方面使他对世界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和乐观精神，一方面对处于两个超级大国压力下的国家安全感到忧虑。

这样一种全球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形势和左翼运动、思潮的高涨，这样一种对战争很快爆发的紧迫感觉，以及对战争与革命相互关系的乐观认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世界形势、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看法，进而也深刻地影响着对国内形势的看法，影响着国内政策的走向。

从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对斯大林模式的全面反思已经开始，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也已开始对苏联原有模式的改革。这种改革一度使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出现了盎然的生机，但也难免因各自的历史传统、地缘政治、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以及各自领导人的不同的经历、素质等等因素，产生了对改革的不同理解和实践，并因此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歧、分化甚至分

裂。应当说,这种争论、分歧和分化是当代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难以避免的。它既给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损失,又推动着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不论社会主义各国、世界范围内各工人党、共产党取得什么成就,发生过什么曲折,都是社会主义运动从古典、近代走向当代的这一历史必然性的产物。

苏联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在没有先例的改革中,虽然针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进行了一些改革的有益尝试,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因历史的局限及个人的缺陷引起了混乱,并使改革逐渐陷于停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已经开始的改革,尽管还只是初步的,都是对原有模式和传统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的否定。例如,给地方和企业以较多的自主权是对高度集中的否定,强调劳动者的物质利益是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不得限制人们物质需求的否定,注重发展商品经济是对传统观念中产品经济的否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则必然要对各种形式的党政不分、高度集权进行修正,如此等等。这种否定对于那些经济已经比较发展、各种物质条件已经比较成熟、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历史过程。而对于那些生产力仍然比较落后或者社会主义制度创立之初的国家来说,对于那些第一位的任务还是在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下迅速发展经济的国家来说,对于那些刚刚胜利地结束大规模的革命战争,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阶级斗争运动仍保持着巨大惯性的党来说,要理解和接受这些不同于经典理论、更不同于战争经验的改革实践,是存在一些困难的。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大国、大党沙文主义曾一度有所收敛,但没多久便又故态复萌,并愈演愈烈。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引起了社会主义各国各党的不满和反对。由于在改革问题上的分歧,特别是由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态度,中苏两党的关系不断恶化,直到六十年代初展开了影响遍及全世界的大论战。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被“和平演变”为一个修正主义的党,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欧洲以至亚洲、南美洲等一些党也已经被演变或处于演变过程之中;苏联等一些党的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是其国内新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共